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空山鸟语

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散文集

主编 堵军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空山鸟语

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散文集

主编 堵军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山鸟语/堵军编. - 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2004.9

(传世散文精品库)

ISBN 7-80698-293-0

I. 空… II. 堵… III. 古典散文-作品集-中国 IV. I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0131 号

责任编辑:崔承范

装帧设计:魏 红

传世散文精品库

空山鸟语——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散文卷

堵 军 主编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, <http://www.ybchs.com>.)

北京市通州区皇家印刷厂印刷

延边人民出版社发行 印数:0001—5000 册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9 印张 3150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8-293-0/I·34

定价:389.00 元(全 14 册)

本卷定价:27.8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散文，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。它同诗歌一样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，从而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，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，特编辑出版这套“传世散文精品库”。

散文文体范围，代有嬗变，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，皆以文学性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，上始于先秦，下迄于清末。各类作品均单独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，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，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散文创作之发展与演变。

本丛书与以前的选本相比，有其显著的特点。一是在原文的选择上，选得比较全面、科学，充分考虑了当代读者的审美情趣，体现了“大散文”的概念；二是在体例上，从读者学习和鉴赏的实际出发，尽量做到通俗易懂，所以每篇原文之后，都有简明扼要的注释、准确的译文和精美的赏析，使读者不仅能读懂原文，还能从原文、译文和赏析中获得多重的艺术享受，并且每本书都

有原文作者的简介,可以使读者对各大名家有一个概括的了解,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;三是各本书的编著者都是当今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,他们以渊博的知识,严格的眼光,科学的治学态度,完全保证了本丛书的内容质量,使本丛书成为“信得过产品”。可以说,这套丛书是当今名人选编、注译并赏析古代名人名作的成功之作。

我忝为本丛书的主编,面对各位前辈的书稿,常被各位前辈谦虚的态度、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。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人大、政协会议期间,赵朴初、谢冰心、启功、夏衍、叶至善、陈荒煤、吴冷西、张志公等八老提出的《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》,深感本丛书各本书的编著者与赵朴初等八老一样,都有一颗热爱中华文化,要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传给青年一代的滚烫的心,这尤其令人敬佩。

古人散文,多览物抒怀。故欣赏佳文,不仅可见锦丽江山,享卧游之乐;同时,还可知古同人之心,作世事之观。然而,古今易代,时移事迁,江山更秀,岂可以今人之心,作往古之幽思?思古人之怆然,惜今人之怡乐,不仅可作今昔对比,亦可激发斗志,再造山河,为后人思我者,作一导游者焉。故选此编,并为序。

编 者

2004年8月

王安石简介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抚州临川（今江西省临川县）人。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。宋代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。曾封舒国公、荆国公，死后追赠舒王，谥文。世称荆公、舒王、王文公、王临川。

王安石出生于一个中下层官吏家庭。王氏一门，从安石的叔祖父王贯之咸平三年（1000）中进士，至安石之弟王安国熙宁元年（1068）赐进士及第止，仅六十年间，就有八人登第，文风极盛。安石的父亲王益，二十二岁中进士，先后在今江西、四川、广东、江苏等地任职，历任韶州（今广东省韶关市）知州、江宁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通判等官。其母吴氏，好学强记，为人正直，教子甚严。王益就官常携妻小同行，安石从小随他辗转各地，拓宽了视野，增长了见识。安石自幼聪明过人，胸怀大志。好读书，博学强记，文思敏捷，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称他“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。其属文，动笔如飞，初若不经意，既成，见者皆服其精妙”。安石行三，兄弟七人：兄安仁、安道，弟安国、安

世、安礼、安上；妹三人：大妹嫁张奎、二妹嫁朱明之、三妹嫁沈季长。夫人吴氏，生二子、二女。长子王雱，“为人慄悍阴刻，无所顾忌。性敏甚，未冠，已著书数万言”（《宋史，王安石传》），曾官崇政殿说书，佐安石变法，为安石所钟爱，卒年三十三岁；次子王旁，安石退居江宁时，曾就官江宁府粮料院，就近照料。长女适吴安持，次女适蔡卞。安石之夫人、兄弟姐妹、子女皆通文墨，能为诗，与安石时有唱和。

仁宗宝元二年（1039），王益卒于江宁通判任上，年仅46岁。安石与而二兄一面居丧，一面用功读书，结识了曾巩、孙侔、李通叔等朋友。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安石应进士第，中第四名。随即被派往扬州，在韩琦幕下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。在扬州任上，他仍然谢绝一切应酬，刻苦自砺，发愤苦读，期待着有一天能以所学报效国家。其时，曾作《忆昨诗示诸外弟》，其中有云：“男儿少壮不树立，挟此穷老将安归？吟哦图书谢庆吊，坐室寂寞生伊威。材疏命贱不自揣，欲与稷契遐相希。”可以说是他少年、青年时期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庆历七年（1047），调任明州鄞县（今浙江省鄞县）知县。上任后，他实地考察了鄞县东西十四乡，利用农闲，组织乡民兴修水利；并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贷仓谷与民，让乡民在秋收后，加二分利息连本归还——这实际上就是日后的青苗法。皇祐三年（1051），就任舒州（今安徽省潜山县）通判；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授群牧司判官。前此，朝中大臣文彦博、欧阳修等，都曾先后上书

皇帝，称赞安石“学问文章，知名当世，守道不苟，自重其身，议论通明，兼时才之用”（欧阳修《再论水灾状》），建议重用他。朝廷也曾授他京官，但安石以家贫口众、难住京师为由，力辞，意欲“得因吏事之力，少施其所学”（王安石《上执政书》）。在上京赴任的路上，认识了青年诗人王令，二人相得甚欢。安石与他有数度书信往来，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和操守。他曾向许多朋友谈到过王令，极力称赞他的才华，为他的早逝哀叹不已。入京后，得以拜谒仰慕已久的、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。此前，安石的好友曾巩已多次致书欧阳修，推荐王安石，但二人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欧阳修十分赏识王安石的才华，作《赠介甫诗》云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，后来谁与子争先？朱门歌舞争新态，绿绮尘埃试拂弦。常恨闻名不相识，相逢樽酒盍留连。”安石亦作《奉酬永叔见赠》，表达了自己对欧阳修的倾服：“欲传道义心虽壮，强学文章力已穷。他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？抠衣最出诸生后，倒屣尝倾广座中。只恐虚名因此得，嘉篇为贶岂宜蒙！”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迁太常博士、知常州；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改提点江东刑狱，旋奉诏入京为度支判官。甫入京，即作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》，将自己思索多年的治国对策，陈之于仁宗。文章分析了宋王朝内外交困的现状，提出在“法先王”的旗号下，变更法度，并认为，变更法度、整顿吏治必须从培养人才入手，抓好“教之、养之、取之、任之”四个环节。但这篇著名的变法纲领性文章并没有引起

仁宗及执政大臣的重视。嘉祐六年(1061),迁知制诰。嘉祐八年(1063),母吴氏病故,丁忧免官,扶灵柩归葬江宁。居丧期满,在江宁收门徒讲学,弟子有陆佃、龚原、李定、蔡卞等。

治平四年(1067),英宗驾崩,神宗即位,安石复起,知江宁府。是年二月,安石长子王雱进士及第。

神宗年富力强,不愿因循苟且,思强国雪耻、有所作为。熙宁元年(1068)召安石进京,越次入对。神宗问安石方今治国之所急,安石对以“择术为先”,并作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,追溯了宋立国百年的历史,分析了当时积贫、积弱的现实,告诉神宗“大有为之时,正在今日”,激励他变更法度。神宗对安石的应对十分满意,次年便任命他为参知政事,从此拉开了变法的序幕。熙宁二年(1069),安石奉诏筹建制置三司条例司,由安石与陈升之同领其事,负责筹划变法的具体事宜。熙宁三年(1070),迁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此后五、六年间,虽然遭到韩琦、文彦博、富弼、司马光等一千大臣的强烈反对,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,力排众议,毅然推行新法,陆续推出了均输、青苗、募役、保甲、置将、市易、方田均税、农田水利等法,在理财、强兵、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进行变革,力图改变有宋百年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。同时,安石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,以适应改革的需要。首先是改组太学,增加生员名额;其次是改革科举制度,以经义、策论代替诗赋以取士,并废除了明经诸科;第三,亲自注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

礼》三经，称《三经新义》，作为科举应试解经的标准，推荐县学、府学、太学诸生使用。新法的推行，在缓和政府财政危机、抑制地主富贾的兼并、培养人才、增强国力等方面，起到了一定的实效。但这种在封建专制体系内部的修修补补，触及了地主阶级的自身的利益，因而遭到了众多王公大臣乃至皇太后的强烈反对；再加上安石自己的偏执、操之过急，以及用人不当和变法派内部的重重矛盾，变法的最后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。

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，朝野保守势力对变法的攻击也日趋激烈。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他们利用天旱、蝗虫等自然灾害大作文章，皇太后更是流涕劝神宗出安石。安石迫于无奈，只得上书求去。是年四月，安石罢相，出知江宁府。但朝中的斗争并未因此结束，变法派与保守派、变法派内部斗争日趋激烈，朝政几陷于混乱。于是，神宗又于熙宁八年（1075）召回安石，使复相位，进尚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监修国史。但由于保守派的激烈反对、变法派的内讧、两宫皇太后的压力、儿子王雱的早逝，使安石陷入极端苦闷与孤立的境地，难以再有作为。因迭次上书，称病求去。十月，诏准免相，使出判江宁。

熙宁十年（1077），安石辞去江宁府之职，仅保留集禧观使这一没有实务的头衔。此后，他闲居江宁，日以读书、作诗为事，偶亦携小僮数人，忘情于山水之间。晚年好参禅，曾注佛经两种，呈神宗，并将所居“半山园”施舍为僧舍，神宗赐额“报宁禅寺”。

元丰八年(1085),神宗病逝,哲宗即位,皇太后垂帘听政,起用司马光为相。从此,新法被逐渐罢去。安石在江宁日闻新法被废,内心忧愤异常,“在书院读书时,时时以手扶床而叹”(《研北杂志》)。元祐元年(1086)四月,安石含愤病逝于江宁,终年66岁。

对于王安石及其所施行的变法,历来评价不一,或奉为圣人而盛赞其事,或斥为大奸而予全盘否定,褒贬悬殊之大,在历史人物中实属罕见。攻击、诋毁安石的人很多,其言论大抵见于《涑水纪闻》、《璠语》、《东轩笔录》、《邵氏闻见录》、《宋名臣言行录》等,他们甚至把安石死后几十年的靖康之耻(徽、钦二帝被俘),归罪于王安石。为此,历来为安石鸣不平的也大有人在,如宋代的陆九渊、明代的王宗沐、李光祚,清代的颜元、杨希闵、蔡上翔、梁启超等。柯昌颐在《王安石评传》中说:“自来诋訾安石者,虽莫不振振有词,然一按其究竟,殆未有不叛于事实。”又引颜元语云:“荆公廉洁高尚,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。及既出也,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。”

我们认为,对王安石及其变法,整体上应予以肯定。

上述两派各执一词,因掺入太多的感情因素,评价难免失之偏颇。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虽多有诬蔑不实之词,但对安石的评价尚有可取之处;另外,宋神宗及反对变法的唐介、司马光的看法,大概也能说明一些问题。现摘录如下:“安石性强伎,遇事无可否,自信所见,执意不回。至议变法,而在廷交执不可,安石传经义,出己意,辩论辄

数百言，众不能讫。”“安石未贵时，名震京师，性不好华腴，自奉至俭，或衣垢不浣，面垢不洗，世多称其贤。”（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）“神宗谓：‘人言安石奸邪则过，但太执不晓事耳！’唐介谓：‘安石好学，惟护前。’”（宋杜大珪《珣珠集删存》卷三）“介甫文章节义，过人处甚多。但性不晓事，而喜遂非。”（司马光《司马文正公集》）我们认为这几段话比较客观，从中不难看出安石为人、行事之大概。

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，并非简单地“泥古”或哗众取宠，而是有其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的。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中有很多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。他曾提出著名的“三不足”之说，即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（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）。他认为，天下万物都是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物质构成，而天象人事无不“新旧相除”；“一柔一刚，一晦一明，故有正有邪，有美有恶，有丑有好，有凶有吉，性命之理，道德之意，皆在是矣”（《洪范传》）。他一生崇奉儒学，兼取百家。他行事以孔子、孟子、韩愈等为榜样，同时认为“百家众技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”，在致他的好友、著名散文家曾巩的《答曾子固书》中，他说：“某自百家诸子之书，至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，诸小说，无所不读；农夫女工，无所不问。”“而（子固）教之以佛经乱俗；某但言读经，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？”他既曾注过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等三经，也曾为《金刚般若经》、《维摩诘所说经》作解，并进献神宗。政治上，他倡导“仁政”，注意民间疾苦；自幼有矫世变俗之

志,反对“因循苟且,逸豫而无为”(《上时政疏》),希望通过“改易更革”达到“富国强兵”、致君尧舜的目的。他所倡导的改革,在一定时期内,对维护宋王朝的统治,改变有宋百余年来积贫、积弱的局面,起到了一些作用。列宁称之为“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,是有根据的。

二

宋代是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繁荣时期。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,唐宋八大家居其六,而且出现在同一时期,可谓一大盛事。宋初骈体及骈散互用的文体盛行,绮靡、浮艳的西昆体风行一时。牛希济、柳开、王禹偁等先后继承了中唐以来古文运动的传统,举起了反对骈体文法,韩愈、柳宗元散文的旗帜。而欧阳修则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影响,和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宋祁、宋庠一起彻底扫荡了不务实际的骈体文及其绮靡、晦涩的文风,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、反应现实生活的道路。

安石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紧密相关,主要继承儒家的传统,同时也接受了其他各家的一些影响。他的文学见解与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墨子、扬雄、韩愈、柳宗元一脉相承,而平生尤服孟子、韩愈。他主张“文以载道”,认为写文章不仅要宣传仁义道德,而且要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教化。在与人论文时,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,如《与祖择之书》云:“治教政令,圣人之所谓文也。书之策,引而被之天下之民,一也。圣人之于道,盖心得之,作而为治教政令

也，则有本末先后……其书之策也，则道其然而已矣。”在《上人书》中则提出为文“以适用为本”，“务为有补于世”，着重强调文章的社会职能。他提倡“明而不华，喜讽道而不刻切”（《张刑部诗序》），反对浮华、绮靡的文风。在《答孙长倩书》中，他即对某一“甚贵且有名”的人提出了批评。而在《上邵学士书》中，他则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观点：“某常患近世之文，辞弗顾于理，理弗顾于事。以骈积故实为有学，以雕绘语句为精新。譬之撷奇花之英，积而玩之，虽光华馨采，鲜缛可爱，求其根柢济用，则蔑如也。”在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，他明确指出：“且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。所谓辞者，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且华，不必实用，诚使实用，亦不必巧且华。要之以实用为本，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。不适用，非所以为器，不为之容，岂亦若是乎？否也。然容亦未可已也，勿先之其可也。”（《上人书》）

安石这一系列文学主张，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文学实践上。他的文学创作，很多都直接受他的政治活动的影响，为变法革新服务。

安石既是散文大家，又是著名诗人。相比较而言，他更为重视散文创作，而视诗歌为余事。在《唐百家诗选序》中，他指出：“废日力于此，良可悔也。”

安石的散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生活的面并不宽，本书将其分为十二类，按论说、记叙、书简、序跋、赠序、传记、赋颂、奏议、诏册、碑志、祭吊、杂体编排。从篇目数量上

看,十二类中,书简、奏议、诏册、论说几类较多,传记、赋颂仅数篇而已,考虑到交叉情况的存在(比如说政论文,除“论说”类里有外,“奏议”、“书简”类中也有,前者如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》、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,后者如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、《答曾子固书》),我们不再一类一类地探讨它的艺术特色,仅择要分析如下。

安石的散文长于说理,他的政论文逻辑严密,分析精辟,说理透彻,极富感染力,是他的文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。著名的《上仁宗皇帝万言书》,分析了宋王朝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,阐述了培养人才、改革变法的必要性,是他关于变法的纲领性文章。这篇文章气势纵横、论证充分,虽长达万言,但脉络清晰,“中间丝联绳牵,提挈起伏,照应收缴,动娴法则,极长篇之能事”(沈德潜《唐宋八家文读本》)。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则对有宋百年来的历史作了总结,分析宋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积贫积弱的现状,指出变更法度势在必行。其他如《上五事札子》、《上时政疏》等,和他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,为变法的推行、实施制造舆论、提供理论依据,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安石学识渊博,行文每每旁征博引,“贯穿经史古今,不可穷诂”(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卷二十五)。其散文受孟子、扬雄、韩愈的影响很大。柯昌颐云:“就安石之文论之,盖最能学韩愈之奇崛者。昔张裕钊教人治古文,谓学昌黎当先学王半山。诚以其学韩愈即躐乎韩愈之文也。”(《王安石评传》)但其早年的文章摹拟孟、韩的痕迹较为

明显，且略嫌拘谨，不够舒展。欧阳修曾告诫他“少开靡其文，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”，“孟、韩文虽高，不必似之也，取其自然耳”（《曾巩集·与王介甫第一书》）。这对王安石形成自己简洁、挺拔、奇崛的散文风格，卓然成为一大家，无疑有很重要的作用。

相比较而言，安石的短篇小品文写得尤佳。其《孟尝君传读后》，推翻了“孟尝君能得士”的传统说法。该文全篇不足一百字，却持之有据，言之成理，行文抑扬吞吐，曲尽其妙。《伤仲永》则是通过仲永由神童变为庸才这一事实，说明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。文章叙议结合、寓理于事，可谓“词简而精，义深而明”（王安石《上邵学士书》）。其他如《孔子世家议》、《书刺客传后》、《知人》、《太古》等；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安石的文集中，书启数量颇多，除应酬问候者，多以议政论学为主。其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就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典范之作。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之际，司马光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信给安石，对变法提出了批评，并冠以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”等罪名。安石于是作此书，对四条罪状一一予以批驳，并深刻分析了“怨诽之多”的原因所在。文章理直气壮、义正词严，语言简洁犀利，一气呵成。《答曾子固书》则是与好友曾巩讨论治学问题，认为不仅应该读儒家经典，于诸子百家乃至佛经亦应兼收并蓄。这种观点在当时至为难能可贵。

安石的文集中，收有墓志铭、墓志、墓表、神道碑共约

百余篇。梁启超称这些文章“结构无一同者，或如长江大河，或如层峦叠嶂，或拓芥子为须弥，或笼东海于袖石，无体不备，无美不搜，昌黎之外，一人而已”（《王安石评传》）。这个评价虽然不免带一些个人喜好的感情色彩，但基本属实。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安石的好友、青年诗人王令（字逢原）病逝，年仅28岁，安石为作《王逢原墓志铭》。这篇文章虽然不长，但感情十分真挚，表达了万分痛惜之情。安石自称“此于平生为铭，最为无愧者也”（《与崔伯易书》）。其他如《王深甫墓志铭》、《金溪吴君墓志铭》等，皆可圈可点。当然，其中也有一些是替人歌功颂德或碍于情面而作者，如《赠奉宁军节度使追封祁国公宗述墓志铭》、《赠右屯卫大将军世仍墓志铭》等。但总的来看，安石作墓志铭的态度是严谨的。他曾为钱公辅的母亲作《永安县太君蒋氏墓志铭》，钱公辅看了后不满意，要求修改。安石立即作《答钱公辅学士书》，表明自己作墓志在于记大节，不愿修改。

此外，安石的记叙体散文中，也多有佳作，如《游褒禅山记》、《芝阁记》等，都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精品。

总的看来，安石的散文长于说理，逻辑性强，布局严整，文势迭宕起伏，运笔倔强、峭拔，柯昌颐引魏禧之言云“介甫文如断岸千尺，又如高士溪刻”（《王安石评传》）。其文笔极为简洁而用意深长，刘熙载《艺概》说：“半山文善用揭过法，只下一二语，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，是何简贵！”又云：“荆公文”，是能以品格胜者。看其人取我弃，